

餘姚籍海外和港台人物錄



余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余姚市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

余姚籍海外和港台人物录

《余姚文史资料》第十辑

余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余姚市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

合编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序 言

朱家龙

余姚地处浙江东部，南临四明山，北濒杭州湾，为宁绍平原之中心。历史悠久，文化昌隆，经济比较发达。早在七千年前，这里的河姆渡先人就以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营构成居，农耕渔猎，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在长江流域的发祥地。

余姚，有龙、凤、龟、蛇四山环抱，百里姚江一水中流，地灵人杰，名人辈出，据1921年商务版《中国历史名人大辞典》载余姚籍人士多达一百三十七人。东汉高士严子陵以高风亮节，名垂千秋。唐初重臣虞世南具“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永载青史。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不仅“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并以其开创“姚江学派”而播声海内。明清之交的朱舜水、黄宗羲，或以中日文化交流之使者褒称“胜国宾师”，或以“浙东史学”派鼻祖而名重当代。早在北宋大政治家、大文学家范仲淹称余姚为“东南名邑”，以后，又被誉为“文献名邦”，而今，又为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余姚濒临东海，早年就有与海外邻国通商、交往的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间，更有大批姚籍人士，出于种种原因，跨海外出，分别从事文化、科技和经贸活动。至今，已

有数万之众散居于近三十个国家与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姚籍同胞，在异国他乡饱受欺凌，历尽艰辛。但是，其中的大多数人，发扬了中华儿女爱国怀乡的高贵品质和勤劳勇敢的传统美德，顽强拼搏，艰苦创业，终于在各自的事业中获得了不同的成就，有的已成为当地以至国际社会中的知名人士。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华人、华侨和港台同胞得以扬眉吐气，大展宏图。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以拳拳赤子之心，眷恋故土，为国效力。四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他们之中，有的通过文化艺术交流，促进对外开放；有的回乡探亲、观光，加强海内外联谊；有的牵线搭桥，引进国外科技、设备和管理经验；有的直接投入，兴办合资、合作企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等等。这些爱国爱乡的热情和造福桑梓的业绩，受到父老乡亲的赞扬和崇敬。

为了实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共同目标，为了使家乡亲朋与海外赤子增进互相了解，余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联合编辑出版《余姚籍海外和港台人物录》，以介绍近百年来部分姚籍知名人士创业海外、造福乡里的事迹。此举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忱支持和鼓励，在海外和港台地区，吕衷才先生亲自征集、撰文，陆章铨等先生还审阅文稿。在市内，归国华侨联合会、台胞台属联谊会，为提供人物资料，协助征稿、编辑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致以亲切之谢忱！

姚籍人士遍布五洲四海，这里收录的人物，只是其中的少数，而且在所录人物中，也只是创业生涯中的一个片断。同时，受时间空间条件的限制，不少资料无法核对，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谨请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目 录

序 言 朱家龙 (1)

采 写 篇

著名银行家宋汉章	胡 原 (1)
近现代教育活动家蒋梦麟	吕衷才 (6)
一生从医的徐斌	徐松立 徐松南 (11)
中国早期妇运工作者吕晓道	魏祖远 (14)
擅长司法业务的徐世贤	徐永年 徐松立 (16)
国民党职业外交官叶公超	叶庆炳 叶叙足 (18)
郭肇唐回姚小记	姜枝先 (21)
著名律师张元杰	吕衷才 (23)
美国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王泰生	袁子良 (26)
建筑业巨子史济樵	袁子良 (32)
美籍华人女作家应文婵	袁子良 (37)
国际名报人谢然之	吕衷才 (43)
国际航运企业家何兆丰	侨 光 (47)
意籍著名华人丁大为	水 齐 (51)
对外经济贸易高手黄志炯	吕衷才 (53)
房地产业巨子陆章铨	吕衷才 (57)
文学博士杨启樵	侨联 供稿 (61)
社会活动家沈君山	吕剑文 (63)
美国第一位华人副州长吴仙标	宋彤 知乐 (66)
企业管理学家洪建勋	吕剑文 (75)

徐松南徐松源兄弟俩博士	徐松立(79)
美华集团董事长朱艺峰	朱文梁(83)
香港科伦投资集团总裁张宇	侨谊(91)
一代书家魏乐唐	计文渊(96)

自述篇

旧中国空军奠基人黄秉衡	邵伯衡整理(100)
谋生择业在两岸	吕衷才(106)
海外四十年	吕渔亭(110)
我的文化生涯	陈汉山(115)
让中国家具艺术品走向世界	周金龙(118)

转载篇

著名农业科学家沈宗瀚	杨士谋(124)
旧中国总工会主席周学湘	(130)
政法界著名学者阮毅成	阮大方供稿(131)
一生从政的谢耿民	(135)
政治硕士姚舜	(136)
大学教授沈树雄	(137)
医学博士冯增瑞	徐正德(138)
谷物研究博士岑卓卿	(143)
比较文学与叶庆炳	(145)
宋汉章的养孙女宋能尔博士	李百祥(146)
化学博士劳长春	(149)
商业管理硕士周昌隆	(150)
后记	编者(151)

著名银行家宋汉章

胡 原

宋先生是中国现代金融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为发展中国的金融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宋先生名鲁，号汉章，生于1872年，在1949年离国转去南美，后回香港定居，于1968年12月病逝香港，享年九十七高寿。

宋先生世居余姚丰南浒塘廊厦宋家，离县城十华里，背靠丰山，面临平川，绿水环绕，风光秀丽，沪杭甬铁路横贯而过。

宋先生父名世槐，字禹良，号夏善，早年在闽办理盐务，因此全家迁居福建建宁县。夏善生四子，汉章居二。夏善中年携眷回乡，在县城老西门置有房产，取名“积庆堂”。

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电报事业萌芽，夏善受邑人经莲珊之邀去上海协办铺设沪淞电线工作，宋先生随父去沪，就读于正中书院。毕业后到上海电报局工作，在工余又读夜校。他学习极为勤奋，通晓英语，又信仰天主教，由此结识了不少洋人。

1900年宋先生进了中国通商银行工作，负责洋务。正当洋务派兴起，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向清政府提议：授以设在上海的通商银行总行，可发行银圆、银两、纸币的大权。这就是我国银行发行纸币的开端。通商银行被官僚掌权，弊窦丛生，放贷款被操纵，无法收回，为此银行派宋先生去北京处理

债务，取得成效，显出了他的办事才能，由此受到当局的器重。

1906年宋先生受钱琴西之聘，出任北京储蓄银行经理。当时大清银行、储蓄银行都归清政府度支部管辖，宋先生被委派到上海，出任大清银行沪分行经理。上海是全国经济、金融中心，从此他在金融界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发生，上海光复。沪军都督陈英士要大清银行筹措军饷白银五十万两，并责令与北京总行割断关系。宋先生考虑大局尚未澄清，一时犹豫不决，陈英士不悦，但因大清银行设在租界碍难下手，便将他诱捕，被关在曹家渡都督府。租界当局哗然，陈英士之弟其采，以上海市面为虑，劝乃兄不要加害，后经伍廷芳从中斡旋才释放。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清帝退位，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宋先生向南京政府申述，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被政府接受，委派中国银行沪行经理张嘉璈为副经理。他又提出大清银行商股不能作为清政府财产，从而卫护了商股利益。

1916年袁世凯阴谋称帝，为向外国购买军火，以备打内战，攫取银行储备金，命令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现。交通银行遵令照办，而宋先生拒绝。他认为银行一旦停止兑现，必将引起市场混乱，影响社会。他一方面得到上海外商银行的支持，决定抗命；同时委托几家商业银行及钱庄代办兑换。经过一星期挤兑，人民看到中国银行实力雄厚，人心渐定。袁世凯曾欲暗杀宋先生，幸得上海银行团的维护，才未遭毒手。从此，上海中国银行声誉益隆，当然这与宋先生坚持信用，不畏强暴，不肯屈服分不开的。

1927年北伐胜利，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黄郛、陈其采、

钱新之等人组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向中国、交通银行借款各五十万元，宋先生不同意，乃避到宝隆医院养病，作为缓冲。后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名义提升宋先生为中国银行沪区行总经理，并推为常务董事，而实际叫他让出沪行经理职务，改有贝淞荪为沪行经理。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全国经济、政治中心南移。翌年，中国银行总行从北京迁移到上海，派张嘉璈为总经理。其领导机构的变动，宋先生未与闻。中国银行之发展，使分支机构遍布国内外，汇划到处通行，信用卓著，有宋先生一份心血的。

1939年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原总经理张嘉璈调任新成立的中央银行副总裁，所遗中国银行总经理一职，逐鹿者很多，结果落在宋先生身上。原因有二：一因宋先生在金融界有卓著的信用，特别是与外商银行关系密切，信任他；二因宋子文等深知宋先生植誉于国内，可以号召存款，多发纸币，于政府有利。当时在纸币上凡印有宋汉章的签章，群众就信任不疑。

宋先生用人不拘一格，重视人才，如姚人史久鳌、潘久芬、冯仲卿，桐乡程慕灏，上虞经润石、胡稑芗、严成德等都被提拔而担任重任。

宋先生还在中国银行内首创了基金检查制度，每月邀请上海市总商会、钱业公会等单位会同检查中国银行基金储备情况。规定以六成现金、四成证券作为储备金，检查后将结果登报公布，以昭信用。以后，中国银行主管虽变动，但从未废弃这一中外通例的制度。这一做法，对稳定金融事业，取信于民起了很大的作用。

宋先生又一贡献是在保险业上。他鉴于外商在上海等地开

办保险公司，国家利权外溢。为了挽回利权，他创设了中国保险公司，经理处就设在中国银行内，自任董事长（兼职不兼薪），他擘划经营，使之稳步发展，从而为中国保险事业奠定了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银行总行迁到香港，宋先生也到了香港。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沦陷，他亦随总行再迁到重庆。直到抗战胜利，才返回上海。

宋先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担任过中国红十字会董事，上海银行公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妇孺救济会董事，浙江会馆董事，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董事等。他热爱桑梓，仅在余姚，就为故乡救火会添办新式消防器材，在故里创办了宋氏小学。抗战胜利后，他已届古稀之年，感到故乡还没有一所完善的现代化医院，以保障人民的健康，亲自募捐创办了“阳明医院”（即今市人民医院）。并亲自来姚，为医院主持奠基典礼，临现场、观施工。完工后，特派侄子留法医药博士宋梧生出任院长。并邀请著名医师来院，如内科主任郭霭然、李忠铭，化验师司徒旺等，为病家治病，造福桑梓不浅！

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国民党上层人士惊慌不定。宋先生曾同张元济、陈叔通等老友约定，留在上海，而国民党则强胁他去台湾，他坚决拒绝，最后他飞往巴西，住在次子美扬家里。美扬时任中国银行巴西分行经理。1962年余姚发生水灾，余姚旅沪同乡银行家史久鳌、潘久芬，实业家高培良等组织慰问团，并随带医药费五千元来姚。宋先生的幼子康宁、媳妇何香媛同来。同乡们对宋先生耄年侨居海外表示关切，请他回国。次年他计脱巴西，乘飞机辗转到了香港，以中国银行董事身份住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楼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怀宋先生

远途到港，乏人照顾，同意他的幼子康宁、儿媳何香媛去港侍奉老父。宋先生曾请人代写信给乡友张启钊、姜枝先，表示对祖国的眷念之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终于失去联系。宋先生未能返回大陆，于1968年12月病逝香港！

宋先生元配毛氏，丰山本村人，继配史氏，为姚城江南史桂轩之女。有三子二女。长子杏村，曾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中年夭伤；次子美扬，侨居巴西，是民族工商业家荣德生之婿；三子康宁，当年在香港开设牙科诊所；大女儿曼卿，与葛姓医师结婚，已逝；幼女小曼，当时未嫁。

观宋先生一生，自少至壮，勤奋学习，熟谙国际金融趋势，懂得开辟金融的途径，他在登上金融界首席地位之后，掌握金融界枢纽，忠于职守，坚持原则，重信誉，重客户和群众利益，因此得到人们的拥护和爱戴。

宋先生清操励俗，一生廉洁奉公，公私分明，不为流俗所染，在旧社会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周旋洋场半生，同外商接触频繁，人称他为“宋大班”。在国内虽与政界人士有所过从，但他很少参与国内外友人的交际应酬，无官场和市侩习气，也无利用职权搞私人企业投资或买卖股票等唯利是图的行为作风，值得后人钦敬！

近现代教育活动家蒋梦麟

吕衷才

蒋梦麟先生，又名孟邻。1886年出生于余姚北城武胜门内，1964年5月19日因肝癌卒于台湾台北市，享寿79岁。

根据蒋氏族谱，其祖先是从徽州迁到奉化暂住，又从奉化迁到余姚，从迁余姚的始祖传到先生已是第十七世。

先生上两代营钱业，家境小康。他有三兄一姊，排行老五。出生前夕，其父梦到一只熊登堂入室，次日出生后就取名梦熊。先生后来考取浙江高等学堂，为了先前的学校闹了事，梦熊这个名字被列入黑名单，于是改名梦麟。

先生六岁入私塾启蒙，先读《三字经》。童年教育枯燥乏味，但因向往参加科举考试，决定努力而学，其父自然同意，亲自送先生去绍兴中西学堂求学。

先生在绍兴读了两年书，知识大增。当学期结束，一家人由余姚迁到上海。先生暂时进了一家天主教学校继续念英文。

先生十五岁，其父又带他回到故乡，他在县城一所学校里念英文学算术，另外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中文。

大概一年之后，先生到了杭州，进了一所非常落伍的学校。他原以为在这里可以学好英文，但事与愿违。结果失望地离开了，后来，其他同学也跑光了。

先生十六岁，参加浙江高等学堂考试幸被录取，就以梦麟

名字注册。

先生在浙江高等学堂里所接触的知识非常广泛。从课本里，从课外阅读以及师友的谈话中，对中国对整个世界的知识日渐增长，这是他后来对从事西洋史研究的一个基础。

这年初冬，先生从浙江高等学堂去绍兴参加郡试，并考中了附生（相当于秀才）。后又回学堂受新式教育。

两个月以后，寒假到了，先生奉乃父之命回到故乡，接受亲戚朋友的道贺。先生其时年仅十九岁，他的二哥梦桃，已经早几年考取了秀才，那时正在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读书。

先生在故乡住了三星期，学校重新开学，他又再度全神贯注地开始研究新学问，在浙江高等学堂再逗留了半年光景，又结束了这一阶段的学业。

不久，先生考取了上海南洋公学，这所学校是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的预科，一切按照美国的中学学制办理，因此南洋公学可以说是升入美国大学的最好阶梯。先生在中国旧学和西洋学科两方面的成绩都很好，有一次还同时获得两类考试的荣誉奖，因此蒙校长召见，加以奖勉。

第二年暑假，先生以中文学分抵补了拉丁文的学分，打算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深造，结果获准进入该校农学院。他的学问兴趣很广泛，选读的功课包括上古史、英国史、哲学史、政治学，甚至译为英文的俄国文学。

暑假过后，那时是1908年8月底，先生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农学院深造，入社会科学院，当时孙中山先生在旧金山办了一份革命机关报——《大同日报》。1909年初蒋先生在该报担任主笔，为该报撰写社论，宣传反清革命。那年一个秋天晚

上，他与另一位编辑刘麻哥成偶，初次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住在唐人街附近的史多克顿街一家旅馆里，很客气地接见两位访客。蒋先生认为中山先生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引力，和他谈话，马上会完全信赖他。

蒋先生后来发现中山先生对各种书都有浓厚的兴趣，不论中文书，或是英文书，中山先生博览群书，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发展有清晰的了解。

1912年，先生以教育为主科，历史与哲学为两附科毕业于加大教育学系，获教育学士学位，并由学校赠给名誉奖，旋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学，获得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夏天离美返国，先到上海游览，然后乘轮至宁波改搭火车回余姚故里。不久，先生离姚返沪，在当时上海最大的书局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并帮助孙中山先生校订实业计划英文原稿。一年后辞职，于1919年初，“新教育共进社”成立，先生在《新教育》月刊任主编。

《新教育》月刊一方面受到思想界革命风暴的影响，一方面蒋先生个人受到中山先生的启示，所以在教育法上主张自发自动，宣传杜威教授在其《民主与教育》中所提出的主张。

“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7月13日，先生接受蔡元培先生的托咐，于危难之中处理北京大学校务，9月间蔡重回北京大学视事，先生亦任该校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后来蔡赴欧旅行，先生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这时先生接到中山先生一封信，对北京大学的各种运动大加赞誉，最后并勉励先生“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

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杭州，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先生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并兼任第三中山大学

(不久改为浙江大学)校长。浙江大学不但主持高等教育，并且主管全省公立学校，教育厅取消，浙江大学校长成为省府委员。一年后先生继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后改任教育部长，仍兼浙江大学校长，因此经常往返京杭之间，旋辞兼职。后以中央大学及劳动大学停办两事，与元老们意见相左被迫辞去教育部长职务，重任北京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为临时大学，(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先生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任红十字会中国总会会长。1945年起，先后任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先生1908年初到美国深造，先学农业，后来改读教育。这似乎不是他一时兴趣的转移，而是有着时代背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行动，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先生于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后，把最后的十五年，又回到了研究中国农业的发展工作。

1948年8月12日，“行政院”例会通过，任命先生及沈宗瀚(余姚人)、晏阳初和另外两位美国博士(莫仕尔、贝克)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委员，于同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上述五位委员互选结果，先生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49年10月，国民政府撤至台湾，先生继续主持“农复会”工作。

农复会旨在注意求农、林、渔、牧各业的增产，以达改善农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之目的。先生一再强调的是“社会公道”或“公平分配”，务使生产增进所得能为生产者与社会多数人民所共享，生产者从这种享受中，发挥勤劳激励作用。

先生见解深远，言论扼要，这因为他深通中西文化及历史的关系。1959年，先生提出“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后，“农复会”乡村卫生组织的家庭计划遂得积极进

行。

台湾的各级各类农民组织的真正权力，过去一向操在非农民的手里。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经济改善，知识水平提高，希望进一步改善生活，意愿亦跟着增强，他们要求在自己切身有关的事务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农复会”利用农民这种愿望，以协助政府进行农会、渔会、水利会的改组。先生极力促进这些组织的健全，并为台湾农村先后训练了近三十万的农村青少年，不仅使他们获得了生产的技能，也同时使他们获得了良好的公民教育。农业推广系统里的农村家事教育，连带把农村中的妇女也现代化了。这些对于台湾农村的影响将是十分重大，而且是十分深远的。

先生主持“农复会”历时十五年，其间曾任台湾“故宫、中央两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理事，曾两度去美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年会，1960年度被任命为出席“联合国十五届大会代表”，在他七十岁时，被台湾“教育部”颁布“当代儒宗”横匾一面。他一生著述甚多，有《孟邻文存》，前半生自传《西潮》和后半生自传《新潮》。

一生从医的徐斌

徐松立 徐松南

徐斌先生，谱名德坤，字子厚。生于1895年阴历十月十六日，卒于1961年，享年六十六岁。

先生出生于余姚县城内江南学后酴醿弄（今改杜义弄），是少卿公之四子，少时游学于杭州、上海等地，嗣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即今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应高等文官考试，得兼任职衔，先后分发至海军部及江苏省政府服医务工作职。迨北伐军抵南京时，入航空总司令部及以后之航空学校任军医长。旋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完成专科学位。为发挥所学及服务乡里，乃回归家中开设诊所疗医，并致力于医学研究。慕名来求医者众多，先生对患者不计较诊费，对贫病者还赠送药物。抗战前，余姚曾霍乱流行，为解救民间疾苦，毅然进入“时疫医院”工作，拯救患者无数。

1937年，日寇侵华，先生应召抗日，前往湖南第十二后方医院任院长。日寇疯狂进攻，大批伤员送入后方医院，然当局对后方医院给养不足，办理极为困难，乃辞去后方医院院长职务，进入湖南国立第十一中学任校医，兼教卫生课程。

后余姚亦告沦陷，先生考虑生活能自理的孩子不能受奴化教育，趁赴沪公办之便，托人把两侄一女接去他那里求学，未料在金华转车途中，列车被炸，险些丧生，为安全计，忍痛让